

『齐心协力建包钢』

□ 孙杰

在塞外草原，阴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包头，矗立着一座大型国有企业，这就是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钢）。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当年，党中央是如何作出建设包钢的决策、全国人民又是怎样支援包钢建设的呢？

改变内蒙古落后面貌的重大举措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1947年5月1日，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百废待兴。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王公贵族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残酷剥削，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十分闭塞，运输工具简陋。因此，尽快改变内蒙古地区的落后面貌，成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共同期盼。内蒙古自治区外接俄蒙，内联东北、西北、华北，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资源富集。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中国地质工作者丁道衡在途经白云鄂博时，首次发现白云鄂博主峰裸露的铁矿体。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在内蒙古地区开采和建立钢铁企业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内蒙古地区建设国家大型钢铁企业和工业基地，开发和利用内蒙古地区的丰富矿产资源，成为党中央的重大决策。

要把包钢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绝非易事。为此，党中央对包钢建设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钢铁工业会议，会议确定对包头附近的白云鄂博铁矿资源进行调查，决定把包头列为关内未来钢铁中心的目标之一。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我国的“一五”计划，计划明确提出了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为重点。包钢作为我国三大钢铁企业之一，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中央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布局中的重大项目。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展示

包钢建设汇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真诚帮助和大力支持，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方针，书写了民族团结一家亲、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奋斗赞歌。

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包钢建设的最大特色。早在包钢建厂的筹备阶段，就面临着技术、人才、工人短缺等难题。为了解决包钢建

设的技术问题，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地质部、重工业部、北京大学等单位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撑。为解决人才和技术工人问题，1955年2月，鞍山钢铁公司支援包钢建设的第一批人员到达包头，这批人员包括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各工种的工人，从1957年起，国家又从鞍钢调入技术领导干部350多人。为了加强党对包钢建设的领导，国家还从华北地区的一些省市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充实到包钢领导层。从1954年起，来自全国各地的8万名建设者汇聚祖国北疆，这批建设大军和内蒙古各族人民一道，在荒滩戈壁上，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团结协作，顶风沙，战严寒，斗酷暑，风餐露宿，肩挑人扛，在塞北草原上书写出“各族人民建包钢，白云鄂博献宝藏”的动人篇章。

1958年7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兰夫就包钢建设项目中的问题，致函请求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湖南、安徽各省对包钢的建设给予支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包钢建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冶金工业部、铁道部等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包钢建设面临的问题。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乌兰夫就包钢建设中的问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请全国各省市支援包钢等7项建议。毛泽东指示：要想办法为包钢解决问题。党中央决定在全国统一计划下，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将包头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地区，要求同包钢有协作关系的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给予包钢大力支持。1959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的社论，社论号召全国支援包钢建设。在“全国为包钢，包钢为全国”的口号下，全国上下，各地区、各企业、各部门积极行动，掀起一个全国支援包钢的热潮。全国各省、区、市的援建人员和大量建设物资纷纷开赴和运往包头，飞机、火车、汽车甚至马车、驴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运输车队成为包钢建设最壮阔的风景。

党中央对包钢建设的关怀，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包钢职工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包钢职工焕发出极大的革命干劲，加快了包钢的建设步伐。1959年10月15日，周恩来亲自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1960年5月5日，乌兰夫亲自为包钢一号平炉出钢剪彩，红色铁流从崭新厂房奔涌而出映红天际的那一瞬间，包钢结束了内蒙古自治区不产“铁”“钢”的历史，开创了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新纪元。

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历史见证

包钢的建设，离不开国家的支援，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汗水和泪水，见证了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光辉历程，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谱写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的和谐乐章，更是内蒙古被周恩来誉为“模范自治区”的真实写照。包钢的建成投产，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包钢不仅是包钢人的包钢，更是全国人民的包钢。1963年董必武参观包钢，曾写下了“钢铁于国，工业化基。赫赫包钢，开创基奇”的诗句，盛赞包钢开创了我国工业化建设奇迹。

包钢建设也书写了各民族建设边疆的壮丽篇章，印证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血肉联系。早年的白云鄂博，曾经有一座蒙古族牧民祭祀山神的敖包，每年牧民都要在敖包前祭祀白云鄂博这座神山。1957年，国家决定开发白云鄂博铁矿时，当地牧民们出于对神山的崇拜，希望不要动这里的敖包。为了包钢的建设，乌兰夫亲自与那里的僧侣和蒙古族牧民进行座谈、交流，阐述国家建设包钢的重大意义，讲述建成矿区一则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二则蒙古族牧民可以到矿区、进包钢当工人，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一员。经过乌兰夫的耐心解释，深明大义的蒙古族牧民和僧侣同意搬迁敖包，将白云鄂博的敖包迁到20公里之外的白云查干山上，这是蒙古族群众对包钢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蒙古族群众展现了舍小家、为国家的家国情怀，写下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历史佳话。

建设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烟台抗日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陈海清

革命烈士用鲜血生命所换取，烟台和平民主之基，乃革命烈士用光荣牺牲所奠定。抚今追昔，益怀革命烈士之功德。

目前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继续其卖国内战独裁的罪行，战争烽火到处燃烧，全国同胞横被蹂躏，独夫民贼，祸心不死，企图以武力强夺我革命先烈以生命鲜血所换来的果实。我烟台广大人民愿宣誓于烈士在天之灵：我们当万分珍惜烈士的事业，一丝一毫不容有所损伤。我们当学习革命烈士的榜样，继续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消灭任何反动派的进犯，保卫烟台，建设烟台，建设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烟台市副市长徐中夫敬撰
孙云锋敬书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立

700余字的碑文记载了烟台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从日军手中解放烟台的主要经过和烈士们的光辉业绩。

烟台是八路军解放最早、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

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解放区军民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10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部队向日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同日，蒋介石却发布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命令。针对这一态势，中共胶东区委于8月14日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紧急指示》，指出新形势下军民的基本任务是紧急动员起来，立即向日伪军发动攻势，完全收复胶东一切沦陷国土，党、政、军、民要把工作重点转到全面反攻上来。随即，由胶东军区部队组成的山东军区第三路军，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的率领下，从8月16日开始，向胶济路东段沿线、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的日伪军展开全面进攻。8月24日晚10时，经过7天7夜的激战，沦陷近8年的烟台被八路军收复。烟台成

为当时八路军解放得最早、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

烟台为配合解放战争胜利作出特殊贡献

烟台是八路军渡海北上的出发地。烟台解放当日，胶东区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先后派出两支挺进东北先遣支队，赴东北了解情况和开展工作，并根据先期到达部队的汇报，致电党中央和山东分局，建议速派部队和干部开赴东北，以争取时机，更好地完成支援东北解放区的工作。这为党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烟台作为连接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海上要道，是挺进东北的捷径。随着烟台的率先解放，整个胶东半岛北部海岸的大小港口全部控制在八路军手中，我们党掌握了向东北运送兵力的重要通道。从1945年10月初到11月底，山东军区先后有6万余人挺进东北，为开辟东北根据地赢得了时间，为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烟台是东江纵队北撤的落脚地。东江纵队是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广东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让出长江以南8个解放区，武装部队撤到长江以北。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2583人分乘美方提供的三艘登陆舰，由深圳大鹏湾起航，于7月5日到达烟台港。东江纵队在烟台经过两个月的休整，稳定了思想情绪，补充了给养装备，提高了军政素质。后来，东江纵队正式编入华东野战军，为解放全广东作出了重要贡献。

烟台是党接管城市的试验地。抗战胜利后，对于如何进行城市建设，发展工商业，我们党还没有成型的经验。1945年8月25日，即烟台解放第二天，胶东区委就发出《关于收复城



市的工作指示》，要求摧毁一切伪组织、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维护社会治安；组织动员各业商号开业营业、工厂开工生产；等等。1946年1月，根据胶东区委指示，胶东区各救济总会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研究部署了今后开展城市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方法、步骤。此后，烟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管理下，日新月异、欣欣向荣。

烟台是党涉外工作的斗争地。抗战胜利后，为挫败美舰登陆烟台的企图，烟台党、政、军、民在党中央领导下，与美军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涉外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47年5月23日，烟台人力车夫杨禄奎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台办事处美籍职员史鲁域琪驾车撞倒身亡。烟台市委政府妥善处理杨禄奎事件，维护了民族尊严，振奋了民族精神。合理处置这两起重要涉外事件，是我们党外交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涉外斗争经验。

首次解放的烟台，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 and 深厚的革命基础，成为我们党在沿海地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为配合解放战争作出了特殊贡献。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丁志伟

杨明斋：早期党组织的重要创建者

教的俄国教授柏烈伟的介绍，见到了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主持下，与一批进步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座谈。1920年5月，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抵达上海，持李大钊的介绍信会见了时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后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等人。通过会谈，维经斯基、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达成共识，决定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由杨明斋负责随后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杨明斋也由俄共（布）党员转为中共党员。从北京赶往上海的途中，杨明斋还在济南会见了王翔千、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直接推动了济南早期党组织的创建。

（一）

杨明斋1882年3月生于山东省平度市明村镇马戈庄。杨明斋聪颖好学，15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因为家境每况愈下，1901年4月，杨明斋到俄国海参崴当了一名工人，后又深入西伯利亚矿区半工半读。随着阅历和知识的日渐丰富，杨明斋对于祖国和个人的命运越发担忧，他认为当今世界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将不保，修身不得，齐家不能。十月革命前，杨明斋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了保卫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杨明斋不遗余力地动员华工参加红军，支援前线。

1920年1月，共产国际接受俄共（布）远东局的建议，同意以共产国际工作组的名义，派人到中国工作。这个工作组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成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马迈耶夫等人。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来华前夕，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正积极酝酿建党事宜。1920年4月，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

播马克思主义的通讯社，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武装。

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后，随即决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杨明斋负责指导。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阳里6号宣告成立，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等8人为创始人和首批团员，俞秀松为书记。以后的团中央机关也设在渔阳里6号。

为了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为了培训进步青年赴俄国深造，上海早期党组织在渔阳里6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校长为杨明斋。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早期党组织从外国语学社挑选了一部分学员，分批赴苏俄学习，其中的不少学员成了著名的革命家，譬如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汪寿华、彭述之等人。

杨明斋最重要的著述，莫过于1924年6月出版的《评中西文化观》和1929年2月出版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

《评中西文化观》是中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研究中国问题的最早的系统性论著。当时担任湖南党的负责人的李维汉，认为在“真伪是非不易辨白的时候，有了这部书，可以帮助青年解决很多的疑难……人的意识决定于人的社会生活，只有从人的社会生活方面可以解释人的意识”。

《中国社会改造原理》可视为《评中西文化观》的续篇或者姊妹篇，《评中西文化观》侧重于批判，《中国社会

改造原理》侧重于系统论述。《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主张从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以西方文化的精华取代中国文化中过时的部分，以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改造中国。

（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为了纪念孙中山，苏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党中央将选派干部赴苏学习的重任交给了杨明斋。杨明斋送走第一批学员后，又亲率第二批学员从上海乘船赴苏联。第二批学员共百余人，包括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治方、沈泽民、张琴秋、黄秀珍、俞秀松、王哲等人。

杨明斋亲率第二批学员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又被留下担任总务长。杨明斋担任中山大学总务长的两年多时间，苏联的经济还很困难，物资也不丰富，但他千方百计地改善学生的生活。关于杨明斋，大多数学员印象深刻。伍修权记忆中的杨明斋是“典型的山东彪形大汉”；黄秀珍记忆中的杨明斋“对人直爽没有转弯抹角的虚伪做作”；王哲记忆中的杨明斋“耿直、憨厚、敢说敢干”。

1930年1月，杨明斋再次赴苏后就再也没有踏上祖国的土地。1938年2月，杨明斋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5月遇害。与他同期遇害的，还有苏联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布哈林。